

1945年3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在纳粹德国布痕瓦耳集中营，法国汉学家亨利·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年）因强制劳动积劳成疾，猝然长逝。这一噩耗震动了当时中外学术界。英国汉学家叶慈感叹“不仅是专家学者，整个世界盼望着他来解读中国文化的人们也哀悼他的停笔”。我国学者方豪认为，马伯乐的辞世“是法国的损失，是全世界研究汉学同志的损失，也是中国的损失”。马伯乐是何许人，何以被学界如此看重？

20世纪上半叶，欧美汉学研究的中心在法国。法国汉学有三位领军者，他们是沙畹、伯希和与马伯乐。其中，沙畹是法国现代汉学的开山祖师，伯希和与马伯乐则是他的得意门生，二人的学术造诣“不分伯仲”。沙畹个人则更偏爱马伯乐，其遗嘱便是将“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这一法国汉学的最高殊荣传给马伯乐，足见其对马伯乐的信赖与欣赏。马伯乐同门伯希和也佩服其在古代中国历史文化领域的造诣，称他是“来自中国古代的人物”。作为一个学者，马伯乐视野开阔，学术成就丰富多样，被誉为“欧洲汉学界的权威”，他将法国汉学推向新的高度，为西人认识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汉学研究史上开辟了最多新道路的人”

马伯乐早年以埃及学立身。他与中国的结缘始于1907年。当时在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深造的马伯乐接触到了汉语，旋即被汉语及中国文化的魅力所折服，其视野也开始转向东亚，并拜汉学“巴黎学派”奠基人沙畹为师，开始系统研究中国文献。在1908年及1914年，马伯乐先后在华北、江浙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了解中国古迹与风土人情。数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 从文献学出发求中国历史文化之真

□ 田 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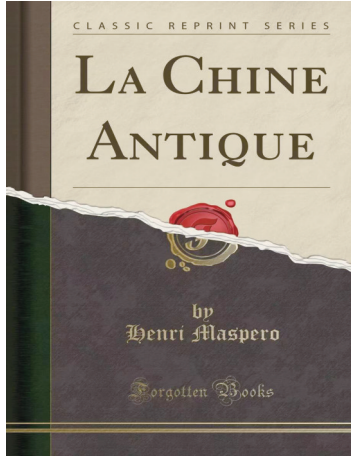
年间，马伯乐以《汉明帝之梦与遣使事》《唐代安南都护府》等论文崭露头角。1911年，马伯乐受聘法国远东学院教授。1918年，沙畹辞世后，马伯乐接下了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这一重任，作为专职研究者和大学教授引领法国汉学的发展。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马伯乐的学术高产期，这一时期他贡献了一批高水平的论文与专著。彼时的法国汉学以博雅学风闻名。和现代人文学者主攻一门专业、画地自限不同，19世纪以来法国汉学的领军者，如雷慕沙、儒莲、沙畹等辈，皆是学问渊深、贯通中西。作为法国汉学的新一代学者，马伯乐也是这一学风的典型代表，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的知识体系是“百科全书式”的。他的学术作品涉及先秦文化史、历史语言学、古代天文学、唐代南越地理、佛道教、民间信仰等领域，甚至也关注世界各地汉学家的研究和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郭沫若的甲骨学研究。无怪乎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称他是“在汉学研究史上开辟了最多新道路的人”。这样宽幅面的学术成就不仅展现出马伯乐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为一个整体的研究立场，更体现出马伯乐过人的学力与智慧。当然，马伯乐的学问除了广博，亦有偏重。他最出彩的领域是先秦文化史、历史语言学与道教。先秦文

化史领域的代表作是专著《古代中国》，该书对先秦中国社会文化作了全景式考察，是马伯乐影响力较大的学术作品。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先生称之为“集五十年来西方上古史研究之大成”；历史语言学领域的代表作是《汉语音位学研究》《唐代长安方言考》，前者的音位学探讨启发了瑞典汉学大家高本汉的汉语研究，后者则构建了一套复原唐代汉语言的体系，影响深远；此外，马伯乐还开辟了西方专业道教研究，对道教教义、仪式、文献等领域研究都有着奠基性贡献。

继承传统而又砥砺创新的研究方法

马伯乐研究古代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法非常有特色，在继承法国汉学传统基础上又能砥砺前行。一方面，他沿袭了导师沙畹为代表的传统治学方法，将对古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一门科学的事业，不泛泛而谈，而是扎根于坚实的文献学之上，重视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目录研究、版本考察、校勘、翻译、注解与细读，力求准确理解古籍文本的意义，弄清附着其上的名物、典故的内涵；另一方面，马伯乐又强调不拘泥于文献本身，而是从文献出发，开展对古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



马伯乐《古代中国》法文版

宏观思考与解读，其代表作《古代中国》可以说是一次对先秦历史与文化整体风貌的巡礼，涉及政治、社会、神话、宗教、战争、文学、哲学等多方面内容，体现出马伯乐统合文献材料，开展综合分析与归纳的能力。相比于其导师沙畹、同门伯希和的埋头文献、专注微观考证的治学路线，马伯乐在方法上实现了对法国学风的革新。

此外，马伯乐还关注西方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新发展，并将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运用在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探讨上。例如他擅用比较语言学工具，对古汉语和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语音、语调等

展开对比研究，指出相比北方游牧民族语言，古汉语和南方少数民族语言更为接近，进而证明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亲缘关系。又如马伯乐在研究先秦史时，采取涂尔干社会学方法，对平民百姓的农业生产、祭祀仪式、社会组织等日常生活关注甚多，并从贵族与平民的社会阶层分野角度分析中国婚姻制度，从而加深了人们对古代社会与民俗的理解。

致力于揭示中国历史文化真相

马伯乐汉学研究的突出贡献还体现在他努力消除偏见与误读，为揭示中国历史文化之真相而努力，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驳斥欧洲所谓的“中国人种西来说”。在先秦史研究领域，中华民族的起源地一度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自19世纪以来，欧美一些学者提出“中国人种西来说”，即认为中华民族与中国文明不是本土生成，而是起源于中亚或西亚地区，其影响力之大，甚至刘师培、章太炎等学者也支持这一观点。马伯乐却从扎实的文献研究出发，对“西来说”提出质疑。在《中国文明起源》一文里，马伯乐分别考察了理雅各、李希霍芬、斯

莱格尔、拉克伯里四位影响较大的“西来说”支持者的看法，指出这些学者的研究存在证据不足、主观臆断、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等错误。因此，“西来说”并没有确实根据，“实在只是建筑在主观和成见上”，继而从根底上动摇了“中国人种西来说”这一西方偏见的基础，进一步确证了他在《古代中国》中提出的观点：中国文明独立于西方，是自发形成的文明。宏伟的华夏古国来自于黄河两岸农耕人民的创造。

二是借助古书还原中国古代神话传说风貌。中国远古社会的神话传说丰富多彩，但经历史潮水洗礼，展现在今人眼前的多是零碎片段。远古神话传说散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儒家传统上将神话看作历史事实，将神话人物看成历史人物，因此“神与英雄于此变成帝王与贤相，妖怪于此变为叛逆的侯王或奸臣”。这种解读方式遮蔽了神话传说的原初光彩，影响了人们对中国起源史的理解。在《周经中的神话》《关于古代中国大洪水传说的通信》等文章里，马伯乐锐意从古代文献中梳理与复原神话传说风貌。通过广泛搜集相关文献、严谨地判别文献时代次序、开展文本译注和解读等方式，马伯乐对“羲和”“大洪水”“重黎绝地天通”等古代记载的人物、事件进行了再审视，成功复原了其中蕴含的神话元素。作为中华民族童蒙时代的文化记忆，神话传说是文化软实力取之不竭的源泉，对于探源中华文明、激活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力具有重要价值。马伯乐在这一领域的前驱性研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梳理、保护与弘扬作出了贡献。



美国对印第安人的强制同化

□ 付成双

自17、18世纪以来，从白人殖民者来到美洲大陆以后，就一直费尽心思解决三个所谓的“印第安人问题”：第一，经济上如何更好地掠夺印第安人手中的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这构成了数百年来印白两族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文化上如何对印第安人进行同化；第三，政治上如何有效控制印第安人及其部落，以保证前两个问题的顺利解决。

直到19世纪末以前，美国社会一直在不断探索其解决方案。美国建国后通过缔结条约、驱逐迁徙、发动讨伐杀戮印第安人战争、建立印第安人保留地等一系列措施，不断蚕食和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随着1830年臭名昭著的《印第安人迁移法》的实施，印第安人被强制赶到保留地。该法案更从法律上剥夺了印第安人部落在美国东部居住的权利，迫使约10万印第安人迁移至密西西比河以西。迁徙开始于炎炎夏日，历经气温达到零下的冬天，每日徒步16英里，成千上万人因饥寒交迫、劳累过度或疾病瘟疫死于途中，印第安人口数量锐减，强迁之路化为“血泪之路”。拒绝迁移的部落则被美国政府发兵征讨、暴力迫迁甚至屠杀。19世纪中叶，几乎所有印第安人都被驱赶到了密西西比河以西，政府把他们强制安排在原住民保留地内生活。

随着印第安人被赶进保留地，绝大部分印第安人的土地已经落入白人手中，他们掠夺印第安人土地的目的已经基本实现，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尽可能多地夺取其剩余土地，彻底解决所谓“印第安人问题”。美国政府为此而祭出了强制同化的“法宝”。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美国政府在19世纪后期，以国会通过的、罔顾印第安人利益和诉求的《道斯法案》为依托，主要采取了三项举措：通过土地私有化运动，解散保留地，推动印第安人向农业定居方向转化；进一步剥夺部落权限，赋予印第安人公民权，减弱甚至消除印第安人的身份认同；发展教育，推行所谓“文明开化”，

根除印第安人的族群意识和部落认同。

以掠夺印第安人剩余土地为宗旨的《道斯法案》

随着美国现代化的扩张，美国西部可供开发的土地却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白人种族主义者又盯上了印第安人保留地。西部诸州对国会不断施加压力，要求肢解印第安人保留地，将印第安人赶出其最后的庇佑地，将剩余土地向白人定居者开放。1887年美国国会《道斯法案》主要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道斯法案》第一项重要内容是以土地私有制代替部落所有制。授权美国总统解散作为法律实体的印第安部落，将部落土地分成若干小块，作为“个人份地”分配给部落中的居住者；联邦政府对所分配的土地保有25年托管权，在托管期内，印第安人不得将其土地出售或转让。

份地制是对印第安人推行强制同化政策的第一步，它首先是为了夺取后者的剩余土地。1887年《道斯法案》颁布之时，印第安人拥有1.38亿英亩土地，到1933年印第安新政行之初，印第安人拥有的土地仅剩下4700万英亩，他们总计丧失了9100万英亩土地。其次，作为强制同化措施，私有化运动的目的还在于摧毁土著部落体制，以“解放”印第安人的名义，使之被迫接受白人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当时弥漫全美的白人种族主义偏见的氛围下，印第安人经常处于紧张、沮丧和恐惧之中，逐渐丧失了信心 and 希望。最后，从执行后果看，份地制剥夺了印第安人仅剩的大片土地，使得他们赖以依存的家园和经济基础丧失殆尽，造成普遍贫困，部落结构松散，前途黯淡。更为严重的是，它“破坏了印第安人的部落体制和族裔传统，瓦解了印第安人保留地，导致印第安人作为一个独

特族裔正在从美国社会中迅速消失”。部落土地所有制的废除使印第安社会解体，部落权威遭受沉重打击。印第安人成为美国现代化道路上的牺牲品。

以消除印第安人身份认同为目的的公民权授予

如果说《道斯法案》“土地私有化”举措，是美国政府欲从经济层面试图以土地分配的形式，来摧毁印第安人保留地进而瓦解其部落的话，赋予印第安人公民权则是美国政府从个体身份认同层面，通过减弱甚至消除印第安人的身份认同，来瓦解印第安部落。

《道斯法案》第二项重要内容是有条件地授予印第安人美国“公民”权。法案规定，凡接受土地分配和脱离其所在部落，接受“文明教化”的印第安人都将被授予公民资格。虽然美国社会在此前曾经零星授予过一些部落成员公民权，但直到《道斯法案》颁布后才开始大规模向印第安人授予公民权。《道斯法案》的第六款规定：“凡获得了分配的土地，出生在美国领土之内的每一个印第安人……只要脱离其所在印第安部落，单独生活，适应文明生活的习惯，就可以宣布他是美国公民，赋予公民所享有一切权利、特权和豁免权。”根据该法的规定，凡是接受份地的印第安人或者自愿与部落脱离关系、离开保留地并接受所谓文明生活方式的印第安人，都可以被授予公民权。

但是显而易见的是，照此规定，被认定为“混血”的原住民必须放弃部落地位，其他人也被“去部落化”，极大地损害了印第安人的身份认同。印第安人获得美国公民权的代价，是必须放弃本该享有的土著居民权利。可见，美国政府这一举措的真正意图是，通过全面强加给印第安人美国“公民”身份，让其

脱离部落进而瓦解部落。

旨在根除印第安人族群意识的寄宿学校

《道斯法案》第三项重要内容就是推行强制“文明开化”。联邦政府在经部落同意后，有权将分配后剩余的土地按每份160英亩为单位出售给白人定居者，出售土地所得的资金由联邦政府保管，用于对印第安人的所谓教育和“文明开化”。教育是作为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实现强制同化的重要手段。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强制推行同化教育，根除印第安人的族群意识和部落认同，接受所谓的美国社会“文明”。在此过程中，臭名昭著的印第安人寄宿学校是一个重要载体。

1875年，内战退伍老兵亨利·普拉特将在马恩堡监狱中改造犯人的那套理论挪用到印第安儿童的教育之中。普拉特认为要实现对印第安人的文化同化，就必须摧毁他们原有的社会体系和部落组织，并将他们纳入白人“文明社会”的认知体系。普拉特最初利用汉普顿学院招收印第安学生，进行教育，并取得了初步成功。美国国会在1879年授权普拉特创办一所新的规模更大的印第安学校，这便是著名的卡莱尔印第安工业学校，这是美国政府所创办的第一所保留地外的印第安寄宿学校，也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印第安寄宿学校。19世纪后期，大规模的印第安同化教育运动普遍开展起来，成为美国社会强制同化印第安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00年，学校数量增加到307个，在校学生达到26451人。这其中寄宿学校153个，在校学生19810人，成为印第安教育的主力。根据美国印第安人寄宿学校治愈联盟报告显示，历史上全美共有367家寄宿学校，至1925年，60889名印第安儿童被迫就学。

在寄宿学校里，美国禁止印第安儿童讲民族语言、着民族服装、实施

民族活动，抹去其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实施文化灭绝。寄宿学校彻底否定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严禁学生穿着民族服饰，男性学生被强制剪去象征印第安人勇气和自豪的长辮，女生则被迫换上符合白人审美标准的裙装。学生在校内只允许用英语交流，禁止使用印第安方言，违反者将受到严厉责罚。寄宿学校作为白人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种族屠杀的延伸，披着文明开化的外衣，对印第安人进行同化教育，企图使他们远离部落传统，否定自身的民族性，同化进白人主流社会。然而，在当时弥漫的白人种族主义社会氛围下，这些受教育的印第安人游走于社会边缘，无法在主流社会中构建起真正的身份认同。

此外，印第安儿童在校饱受折磨，部分因饥饿、疾病和虐待死亡。许多学校由于缺乏资金，设备简陋，宿舍拥挤，更缺少对印第安人理解和友善的教师，印第安儿童在寄宿学校身心都受到严重摧残，甚至有些儿童因为恶劣的校园环境和医疗条件而死亡。如卡莱尔印第安工业学校在1887年时拥有在校学生637人，竟然有21人在学校死亡。此外，虽然许多印第安儿童被迫加入了寄宿学校，但能够毕业的为数不多。如汉普顿工业学校总共招收了1388名印第安学生，毕业的只有160人。在普拉特主持卡莱尔印第安工业学校的24年间，总共只有158名学生从这个学校毕业。

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政府对于强制同化印第安文化的态度逐渐发生转变。1923年，约翰·科利尔对于印第安事务署的工作批评道：“印第安事务的管理是整个国家的耻辱，其政策的设计目标是掠夺印第安人的财产，毁灭其文化，并最终灭绝印第安人。”

1933年，约翰·科利尔出任印第安事务署主管以后，推行印第安新政，倡导回归印第安传统。至此，此前历届政府所推行的有组织地对印第安人的同化政策告一段落。

